

心灵的细节 存在的光芒

——谢有顺文学批评的道路与学术风格

龙其林^①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州 510275)

摘要: 谢有顺的当代文学批评在学界独树一帜, 他从中国文学的闭抑精神中追溯至传统文化的专制、奴役思想与存在大限, 从而超越了细枝末节的文学具象, 以存在主义的敏锐直抵文学的精神内核, 显示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谢有顺文学批评中的救赎精神、苦难意识与独立个性, 对于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人文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谢有顺; 批评道路; 学术风格

The Detail of Soul and the Light of Existence

——XIE You-shun's Literary Critical Road and his Academic Style

LONG Q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XIE Youshun'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s unique in the academic world. Dating back to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yranny, slavery thought and the existence border, his study goes beyond the minutiae of concrete literary images and touches the very soul of literature with sharp existential spirit, revealing a scholar with inclusive mind. The redemption spirit,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found in XIE Youshun's literary criticism are of great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but to the spread of humanistic ideas as well.

Key words XIE You-shun; critical road; academic style

在当代文学研究群体中, 谢有顺是其中成果显著、独具特色的一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 谢有顺便以犀利的思想触觉、宽阔的文化视野和坚定的正义立场, 对“先锋小说”、当代诗歌、散文以及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文化解读和宏观审视, 他的著作《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此时的事物》《文学的常道》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重要成果。谢有顺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在学院派文学研究逐渐沦为一种技术操作、思想日益僵化之际, 以富于理想激情的文学直觉、心灵感悟恢复了文学批评本应具有的内心细节, 在存在主义

的超越视野中直抵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内核, 扭转了文学研究停留于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等单一维度的问题。这种存在主义审视下的文学研究整体观, 实现了文学研究由单维度向多维度的推进, 在终结文学研究与创作实践分裂局面的同时, 也将文学批评从学院派的僵硬框架中剥离, 建构起一种洋溢着生命意识的整体观念。谢有顺文学批评的存在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的精神现象, 他以超越现世表象、直抵文学永恒之道的精神力量与透视存在之谜的洞察力影响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虽然对谢有顺的批评风格与特色已有不少研究, 但是综合考察其文学批评的历程与学术风格的研究似尚未

① 收稿日期: 2009-09-07

作者简介: 龙其林(1981-), 男, 湖南祁东人,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出现,因此对其文学批评道路、精神发展、学术风格的研究就显示出重要的意义。

谢有顺 1972年出生于福建长汀一个叫美溪的偏僻山村,小学五年级时曾因家庭变故辍学跟随乡村老中医习医,一年后重回校园,1990年进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从1991年起在《文学评论》《花城》《作家》等刊物发表影响广泛的文学批评及思想随笔,并迅速成长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曲折人生阅历造就的存在意识、良好的科班训练,以及淳朴、敏感的心灵与时代转型风潮的激烈碰撞,共同构成了他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和透过现象审视存在的学术个性。他凭借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心灵意识与精神力量,以存在主义的高度审视多元的文学现象,“总是不倦地对人的存在发出质疑、追问,对于人的精神价值反复地探寻”,^[17]巧妙地规避了政治、文化、社会、语言视角考察文学所带来的遮蔽,努力还原文学理应体现的灵魂世界,从而找到了契入文学的理想基点。

作为一位具有“从精神天国投射向世俗人生的一道救赎之光”特质的批评家,^[17]谢有顺面向世界存在发出的精神探索,必然使其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小说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关联。于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先锋小说代表作家纷纷进行创作的转向时,谢有顺即对这一作家群体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在当时的国内当代文学批评界,不少研究还停留于对先锋小说的词语迷宫、语言技巧进行冗长分析的层面,谢有顺却在《缅怀先锋小说》中敏锐地发现了先锋派的症结所在,即先锋小说的技艺变迁与精神探索的矛盾,准确地揭示出先锋小说在语言游戏与精神态度中的鸿沟:“先锋小说界沉迷于技术的海洋多年,其内在的探索便显得微乎其微,于是,先锋作家的笔下到处飞溅着大师式的故事、大师式的结构和大师式的语言,唯独缺乏大师式的那颗大质量的心灵”,“先锋小说语言欲望中生存意识的觉醒与操作上的解构主义策略之间构成了当代小说史上的一个重大悖论”。^[2]文章从先锋小说的技术迷津、狂欢化的语言、生存假象和历史主义者梦想的辨析入手,探讨了它们操作上的解构主义与思想欲望中的生存意识的内在冲突,提出了真正的先锋派小说应该是“面对人类生存困境所发出的悲悯与浩叹”,其作用在于“使我们看到,信仰不会消失,它伴随着博爱对孤独的融化,伴随悲悯对苦闷的稀释,伴随激情对迷惘的战胜,伴随崇高对平庸的超越,正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这是人类无法抗

拒的力量”。^[2]此文表现出的存在主义气质与直逼人心的精神叩问,在其后来的著作《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活在真实中》等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谢有顺对先锋小说研究的推进,还体现在他这一时期撰写的系列理论文章。如《绝望:存在的深渊处境——先锋文学中的一个现代主义主题研究》《历史时代的终结:回到当代——论先锋小说的转型》《重返伊甸园与反乌托邦——转型期的先锋小说》等便深入到了文学的精神处境:作者一方面发现了绝望的深渊可以视为“先锋作家对一个假想的世界中心的期待和向往——它是作为神性失落之后人类的一个替代性信仰世界被启用的”,“在本质上未能真正站在绝望的反面,超越存在的悲剧”;另一方面则在余华、苏童和北村等人的创作实践中,察觉到这些作家的作品已从技术迷津中突围,重新获得心灵的深度,“只有家园中心在小说中真正降临,才能以拯救者的姿态反抗绝望,使之成为绝望之后的精神出路”,^[3]敏锐地发现了先锋文学转型的重要内涵。

谢有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大多集中在先锋文学的精神内涵及其转型上,初步展现了其叩问精神存在的批评光芒,但是也存在着批评对象过于单一等问题。如果说这一阶段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谢有顺初露头角的时期的话,那么随着1995年第5期《小说评论》开设的“谢有顺专栏”开始,谢有顺文学批评中的存在色彩、心灵世界与苦难意识逐渐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也超越具体的文学思潮研究而对文学的精神内涵、作家的立场与批评家的勇气进行全面的审视,其批评中体现的知识分子的正义情怀、犀利无比的精神洞察力与恣肆汪洋的艺术感觉让评论界大为振动,文坛第一次全面领略了他学术批评的性格与风采。这一时期,谢有顺对小说的思想价值、写作的意义、难度、尊严以及批评的缺陷、智慧诸多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体现出他对文学研究对象的精神性、复杂性和宏观性的把握。对于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冲突问题,谢有顺把握住了小说的美学冲突与存在冲突之间的差别,认为只有存在的冲突能够窥探时代特质与精神存在,“进入某种文化母体的中心,进入时代的内部,从而说出价值谎言的真相和人的全部危机”。^[4]在大家普遍认可的“真实”概念中,谢有顺发现了这种真实存在的两个维度:“一个是作家所看到的真实,一个是作家所体验到的真实;或者称,一个是眼睛的真

实, 一个是心灵(精神)的真实”;进而, 他进入到中国作家当下写作之所以不断远离真实的内核, 即他们一味相信自己的眼睛而非推崇心灵的存在真实, “他们写作的起点是为了记录下他们所看到的当代生活, 结果他们就被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驱使着从事写作, 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心灵与这些现实的冲突与矛盾, 从而也就无法在写作中给心灵作出定位”。^[5]

进入新时期以来, 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院派批评不断发展, 并依凭高校学术平台获得了话语权力, 这一方面使学院派批评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考据式的学术研究、八股批评大行其道, 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给二者的良性互动带来束缚。对于这种脱离文学实践, 疏离时代精神的文学研究现状, 谢有顺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几乎整整一代人的心灵都长期处于闭抑状态。他们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干扰, 就不愿站在自由与真理的立场上公开说话; 只要能够追求到个人的安定与快乐, 他们也绝不会放弃在语言的世俗肌肤上滑动的狂欢姿态”,^{[6]28} “它反映在批评上, 就表现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生存的感悟, 而是把批评变成词语自身的推演, 或者使批评成为创作的附庸, 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作家吹捧成领导潮流的人”。^{[6]29} 因此, 他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始终坚持与文学创作互动, 既不拘囿于文学批评的狭小圈子, 也不使批评降格为创作的附庸, 而是以独立、平等的态度聚焦于文学批评与创作、文学与当下生存境遇的相互阐释: “我写作小说评论, 许多时候, 是从个人对存在的理解开始进入的, 结果我发现, 它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依然有效”。^{[6]4} 这一时期谢有顺“小说的可能性专栏”中的很多文章, 是同时以文学爱好者与批评家的双重视角进行的, 如《写作与存在的尊严》《写作是信心的事业》《写作与意义问题》《写作的难度》《写作的恐惧》《大师没有现身》等即是此类。在谢有顺之前, 也有不少从作家创作的角度去研究文学的批评家, 但能从世界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写作价值、意义坐标中考察文学, 且能贯之以理论思考的却并不多见。谢有顺在深入把握文学创作的存在维度与心灵细节的同时, 进一步把握了文学创作与时代本质、社会文化心理与精神症候的关系: “到今天, 这种精神的软弱与屈服性依旧有增无减, 奴役作家与批评家的事物也越来越多, 除了体制之外, 还有荒诞的现实、虚无的精神, 以及没有来由的乐观主义”, “一旦批评与现

实间失去了距离, 失去了批判性, 它就可能沦为被操纵的行业”。^{[6]29} 谢有顺对于文学批评中充斥的压迫、奴役、虚无与荒诞有着深刻的体察,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心理存在的探索时, 他坚持的人文精神与超越现世的存在意识获得了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延展。谢有顺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解读, 既是“在借着诗人与作家, 来阐释自己内心的精神图像, 对美的发现, 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像”, 也是一种对民族历史、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的重审, 是不同心灵的碰撞、文化的冲突及其交流过程。如在《刁斗: 价值和想象的边界》一文中对刁斗创作的分析, 即从故事的两种冲突、存在的想象力、从游戏中醒来的角度对作家的价值立场与想象方式进行阐释, 不难发现谢有顺是因为有了心灵向现实的开放具有了与生命存在同辱共痛的内在冲突, 他的孤独意识与存在的体验才会与优秀作家产生情感谐振, 从而由此深入到作家的灵魂世界。

1998年以来, 一批以思想见长的随笔作品席卷文学界, 摩罗、余杰等青年作家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本就具有民主自由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谢有顺, 在此发现了一种适合于自己思想风格、情感表述的有效方式, 这一时期他也创作了不少引起评论界瞩目的思想随笔, 这些作品先后被收录在《活在真实中》《我们并不孤单》《身体修辞》等著作中。这些思想随笔以正义的勇气、理性的思辨, 对闭抑时代的怯懦、孤独、幻灭、极权等精神弊病有着深刻的省察, 力图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精神遗产进行挖掘来获取抵抗堕落、走向新生的文化力量。从文学批评走向思想随笔的创作, 看似一种批评视野的泛化, 实际上却是谢有顺文学批评中一以贯之的存在精神的自然散发。从思想文化角度全方位介入世界文学、文化现象, 已可明显看出他朝着拓展文学研究本体的空间不断拓展的趋势。他从世界文学范围优秀思想著作、文学作品中苦苦思索人类灵魂的处境与时代变迁的内在关系, 仍然坚持着对存在的质疑、叩问的思维立场, 以世界范围内思想大师们的精神标的重审民族文化与文学自我, 试图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文学世界里灵魂的复杂性。思想随笔的创作与文学批评中更为鲜明的灵魂意识, 为谢有顺此后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辽阔的空间。

2003年, 一套“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 一批优秀的评论家与作家携手对谈文学、思想问题, 其中就包括《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这种原生态的对话录, 不仅“改

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7]而且往往能够将思想的火花、灵感绽放的一瞬间记录下来。在这两部对话录中,谢有顺与贾平凹、于坚以开放的思想立场纵论文学现象、思想处境、创作方法、时代语境等诸多命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例如,在与贾平凹的对话中,谢有顺谈到了优秀文学所具有的多义性:“真正好的文学,优秀的文学,它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复杂的,有深度的,甚至是暧昧的,不可解释的,这才符合文学多义、多解的特征”,^[7]¹³这个观点后来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文中得到了发展;又如,在与于坚的对话中,谢有顺认为当前的文学创作非但不应该追求速度,而是要找回一种缓慢的感觉:“我说的耐心,其实就是要重新找回一种缓慢的感觉”,这种缓慢的感觉“是和大地、故土之间的那种感情紧密联系的”,^[8]⁵谈到一些优秀的诗人出国之后无法创作好诗的问题时,谢有顺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身体在离开故土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也被割断了与故土的联系,这样,他的写作就无法再建立起一个能进入他精神世界的有效通道”,这与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指向、写作根基一直是维系在俄罗斯这块苦难的大地上的”情形有着根本的区别。⁽⁹⁾²⁰⁻²¹在这种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谢有顺的敏锐感悟与作家的切身体验激活了双方的思维,从而使对话深入到文学与人心的内核,发掘出诸如“写作是慢的历史”、“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隐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好作家是难以和时代相安无事的”、“作家要反抗历史的总体性”、“文学要和秘密的精神世界相通”、“文学史就是一部争议史、误读史”等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而对话中所展现出的思想魅力与内心世界,也成为我们理解谢有顺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

随着自身理论的积累与文学批评的长期探索,新世纪之后谢有顺的文学批评逐渐地转向于身体伦理、叙事伦理、话语变迁等宏大文学命题的建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文切中肯綮地分析了当代文学存在的对现世道德的依从和对毫无创见的价值趣味的沉溺,认为“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唯有发现,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9]⁴文章对束缚当代文学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日常道德的侵入、超

越精神的匮乏对作家创作的潜在制约,进而提出了灵魂关怀的重要命题:“文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革,若要再指望通过一些局部的改造而获得新的前景,已经不可能;中国文学需要的是整体性的重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文学中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并恢复灵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9]¹³《文学身体学》一文则从被历代文学忽略的身体入手,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身体专制及其危害进行了揭示,通过对《红楼梦》《金瓶梅》《废都》《O档案》等重要作品及“下半身”写作现象的梳理,发现了当前文学创作中的“肉体乌托邦”所具有的革命意义,“它既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反身体的文学的矫枉过正,又是对前一段时间盛行的‘身体写作’中某种虚假品质的照亮”,“他们所深入的,是文学的底部,是道德的最底线,是身体最基本的部分——肉体主义”,^[10]¹⁸³同时,对于一味沉溺肉体主义的创作谢有顺也保持了一种高度的警惕,“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代笔下建立了起来”,“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10]¹⁸⁶另外,《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叙事也是一种权力》《小说的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等论文分别对经验叙事的消费神话、文学话语的历史变迁以及小说在逻辑、情理和常识方面的破绽进行了准确地揭示。

在近来的文学批评中,谢有顺的研究理念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一文中,谢有顺检索了当前文学批评的缺陷,认为“除刻薄之风盛行,批评中言不及义的文字也很多,追问下去,缺乏者有三:一是缺专业精神,无从判断一部作品的好与不好;二是缺真性情,心胸不坦荡、饱满;三是缺基本的肯定,没有生命理想”,^[11]³并提出了解决文学批评这种时代症候的办法:“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11]⁵从而寻找到了应对时代虚无精神侵袭的有效办法。在《从密室到旷野》中,谢有顺由鲁迅与沈从文作品中的精神建构出发,发现了当代小说发展所需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恢复一种感受力,接通一个更广大的物质视野;二是如何从一己

之私里走出来,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灵魂视野”。^{[11]250}他由作家创作从密室向旷野写作的变迁,引发了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全面反思:“除了写身体的悲欢,还要关注灵魂的衰退;除了写私人经验,还要注视‘他人的痛苦’;除了写欲望的细节,还要承认存在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在一己之私以外,还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11]251}这种对新世纪当代文学走向的敏锐洞察和对于构建灵魂叙事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呼唤,是他在存在主义精神烛照之下对新的文学秩序建立的诉求。

纵观谢有顺将近 20 年的文学研究,由 1990 年代初对先锋派小说语言游戏与精神内涵的内在矛盾的发觉,到 1990 年代中对当代文学闭抑精神的批判与反思,由世纪末的思想随笔写作,到新世纪之后文学伦理的寻找和文学话语变迁的勾勒以及对消费社会文化精神的发现,谢有顺走了一条螺旋式发展的叩问心灵之路。如果说谢有顺的思想随笔写作是对世界精神文化遗产的发掘与激活,目的在于“缓解我内心的恐惧、矛盾和不安,带来真正的慰藉,从而描绘和捍卫属于我个人内心的事物:我的疼痛和寒冷,我的现实和梦想”,^[6]那么他对文学存在主义的思考、灵魂叙事的推崇,则是对历经政治、文化苦难后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洞察,力图为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及其读者找寻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这种勇于承担的此在精神与救赎意识因指向了中国文学的灵魂建构与民族精神的自我审问而具有了重要意义。

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特色首先体现在鲜明的民主意识和启蒙精神。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成为谢有顺一以贯之的批评立场,他从中国文学的闭抑精神中追溯到传统文化的专制、奴役思想与存在大限,并将之与人类的自由发展结合起来,使其研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我的文学研究,总是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这两个场域里用力,以对人类存在境遇的了解,对人类生命的同情为旨归”,“好的文学,它要追索的,永远是生活世界发生了什么,人心世界发生了什么;离开了这两个维度,文学就会变得空洞、轻飘,写作就会成为一种造假。‘此心同,此理同’,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9]2}其次,谢有顺的文学批评超越了细枝末节的文学具象,以存在主义的敏锐直抵文学的精神内核。在谢有顺看来,“批

评真正的困境,在于批评家逐渐地失去了对价值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批评家现在最需要恢复的品质是批判性,即精神的锋芒”。^{[10]290}为此,谢有顺规避了文学批评中细枝末节的纠缠,而以罕见的良知、正义的激情为出发点,直接深入文学的精神存在境地,以超越性的精神勾勒传达出时代本质的内涵,体现出一种精神的崇高性与思想的批判性。再者,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广泛吸收了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心理学、人类学、叙事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学说,显示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他倡导了存在主义的文学视野,规避了文学外部研究所导致的忽略文学内在精神的弊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读的同时,在文学精神与自身当下生存境遇的相互阐释中把握住文学所传达的灵魂细节、时代精神与存在意识,体现出卓越的批评智慧和贯通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宏大视野。谢有顺文学批评中传达出的存在意识、心灵内涵和思想价值,烙印上了转型时期精神价值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和学人学术精神发展的文化标本。其批评中的救赎精神、苦难意识与独立个性,无论对于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人文思想的传播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孙绍振.《活在真实中》序[M]. / 谢有顺. 活在真实中.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
- [2] 谢有顺. 缅怀先锋小说[J]. 文艺评论, 1993(5).
- [3] 谢有顺. 绝望: 存在的深渊处境——先锋文学中的[一个] 现代主义主题研究[J]. 文艺评论, 1993(6).
- [4] 谢有顺. 小说: 回到冲突[J]. 小说评论, 1996(3).
- [5] 谢有顺. 小说: 回到真实: 上[J]. 小说评论, 1996(5).
- [6] 谢有顺. 我们内心的冲突[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0
- [7] 贾平凹, 谢有顺.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 [8] 于坚, 谢有顺. 于坚谢有顺对话录[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 [9] 谢有顺. 此时的事物[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10] 谢有顺. 话语的德性[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 [11] 谢有顺. 文学的常道[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黄声波